

导 言

什么是反自由主义？

这一天会到来的，它离我们或许已经不远了，洛克将被列为给人类带来过最大痛苦的作家之一。

—— 梅斯特尔 (Maistre)

自由主义思想和实践的批评者们自然地集结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派别：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已被彻底分析和研究过了，而非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攻击，则很少被人们从一种主要是理论的、批评的视角进行研究。马克思主义通常将自由主义理论贬为商人阶级的意识形态：他们说，所有自由主义的缺点，都来自其为阶级特权和权力辩护的角色定位。非马克思主义的、但又是反自由主义的作家们，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方式。他们很少注意阶级，反而宣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感染了西方社会所有成员包括雇员与雇主，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等等，并使他们降低品格。

马克思主义断言，资产阶级自由纯粹是“形式的”，是为少数人所垄断的特权，归根结底对被剥夺了权利的大多数人而言则毫无用处。相反，非马克思主义的反自由主义者们批驳个人自由理念本身，而非其有选择性的 (selective) 或不完美的现实。马

克思主义批评者通常关注 19 世纪，其时个人权利的思想据称为产业精英所接受，以压制普通男女。非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则更可能将 19 世纪的自由主义同其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先驱们混合在一起。马克思主义者的世俗性不亚于自由主义者（他们要消灭宗教，而自由主义者想使宗教非政治化）。非马克思主义的反自由主义者视世俗主义为道德灾难。同自由主义者一样，马克思主义者将种族身份和民族团结视作特殊主义的返祖现象（他们要消灭种族差别，而自由主义者想将之非军事化）。相反，非马克思主义的反自由主义者将种族根源的割裂视作空前的人类大灾难。

其他同样重要的区别也能列举出来。例如，马克思主义者赞美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而非马克思主义的反自由主义者将科学权威和物质至上主义（*materialistic*）态度的传播解释为自由主义最令人厌恶的两桩罪过。他们不把自己视为法国大革命的继承者，而马克思则着重强调自己是继承者。事实上，在我看来，反自由主义者异口同声地断定，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虽然表面上对立，但共有一个祖先，并且秘密地结盟。它们是一种独有的，精神上徒有其表的启蒙传统的两个分支。

（一 作为一种传统的反自由主义

本书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它完全专注于对自由主义理论和制度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社会主义作家仅当他们基于明显前现代的习惯和理念批评自由主义社会时，才被偶然提及，比如托尼（*R. H. Tawney*）。〕无疑，历史学家们长期以来在研究共产主义通过精神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社会”，拯救堕落的当代社会的渴望。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对“第三种力量”的追求（与其相连的

口号是“非资本主义非共产主义”），已有大量文献记载和讨论过了。两部代表性专著基于完全不同的国家和历史境遇，考察了非马克思主义的反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它们是泽夫·斯特恩赫尔（Zeev Sternhell）的《非左非右》（*Neither Right nor Left*）和安杰伊·瓦利茨基（Andrzej Walicki）的《亲斯拉夫论战》（*The Slavophile Controversy*）。正如这些资料丰富的著作所显示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反自由主义是一种泛欧洲的运动，其历史可溯至至少两个世纪之前^②。这种反自由主义时盛时衰，但从未在历史上完全消失。（反自由主义精神因马克思主义的低潮，以及经济混乱和种族仇恨的短暂混合而复苏，显示出超越了前共产主义世界而复兴的当代社会的某种危险的信号。）

复苏的部族主义（tribalism）和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提醒我们，反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和文化环境存在着。但是，它是，或者曾是一种哲学传统吗？其阐释者发展出了任何严肃的理论主张吗？从根本上讲，它是一种单独的传统，还是一个词语，仅仅是被自由主义的捍卫者们（诸如我自己）所误用，以将鲜有共同点的不同类别的批评者归并在一起的包罗万象的容器？当然，一个通用的标签，例如“反自由主义”，不足以描述我在随后章节中要单独分析的理论家们。它只是简单地帮助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一系列论点和态度上，这些论点和态度为一些自由主义最重要的非马克思主义批评者们所共有。反自由主义是一种有弹性的、形态各异的、相当统一的、完整的（但理论上属于替补角色的）智识传统。当然，其一致性并不在于形式的统一，而在于一些根本的假定，以及最重要的，一个共同的敌人。各种反自由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批评者共有一个核心的态度和信念，这是本书的一个根本前提。因此，在剖析反自由主义理论并考察其各种变体之前，我必须证明这一点的存在。我必须列举并分析

反自由主义的各种阐释者所处的位置，并提供例证，以说服持怀疑态度的读者，证明我不是将一种武断的分类强加在难以驾驭的历史事实之上。我还必须阐明，反自由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攻击，是如何区别于标准的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攻击，以及自由主义对自身的攻击的。

要进入反自由主义作家们的视角，我们首先必须理解，他们旨在抵制和推翻的“自由主义”，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以及为何他们如此厌恶地看待它？为了衡量他们的论点并对之做出完全的回应，我们必须对自由主义概念加以阐释。

（二）什么是自由主义？

概言之，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理论和政治纲领，兴盛于 17 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中叶。当然，它有着重要的先驱，并且时至今日一直是一种活的传统。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家必须包括洛克（Locke）、孟德斯鸠（Montesquieu）、亚当·斯密（Adam Smith）、康德（Kant）、麦迪逊（Madison）和穆勒（J. S. Mill）。自由主义制度和实践首次生发于十七八世纪的尼德兰、英格兰和苏格兰、美国以及法国（法国最不成功）。自由主义原则不仅在理论文本中得以阐明，而且体现于《英国人身保护法案》、《权利法案》、《宽容法》（1679，1688—1689），美国宪法前 10 条修正案以及《人权宣言》（二者都订立于 1789 年）中。

自由主义政治秩序的核心准则是宗教宽容，讨论自由，对警察行为的限制，自由选举，基于权力分立的制度化政府，公开的可监督的国家预算以防止腐败，以及基于私有产权和合同自由、保证持续增长的经济政策。自由主义的四个核心规范或价值是：个人安全（由国家机构垄断的合法暴力，这些机构自身由法律监

控和管制)；公正(单独的法律体系，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个人自由(免于集体和政府监督的、范围广泛的自由，包括信教的自由、拥有可以与众不同的权利、追求邻人认为是错误的理想的权利、旅行和迁徙的自由，等等)，以及民主或通过选举和在自由出版物上公开讨论而参与法律制定的权利。公众异议是一种创造性力量的观点，可能是自由主义政治最新颖、最激进的原则。

关于平等，自由主义的态度是颠倒了的传统主义。在自由主义者所理解的传统社会中，先天的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新的经济不平等是不受欢迎的。自由主义者想颠倒这一模式，禁止贵族统治，但将新兴的财富不平等视作完全合法。^③自由主义者帮助建构的自由主义社会拒绝所有先天性垄断，特别是一些“强大”家族的权威，这些家族拥有大面积的土地。但是，古典自由主义者并不是极端的平等主义者，因为他们认为，贫穷和依赖是比经济不平等本身更为急迫的问题。为什么？自由主义者欢迎商业社会，因为他们深信不疑的是，经济竞争(同经济不平等一起)将产生足够的经济繁荣，以增加“最底层人民”的福利、个人安全和独立。

(三 自由主义的错误

这种关于自由主义的简短的概述，是极端简要和不充分的。^⑤但是，即使简短的评论，也有助于准备一个介绍自由主义的敌人的平台。自由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诋毁者们所指控的这样一种哲学或意识形态，到底属于哪种罪行？他们在自由主义实践与制度中看到了什么缺点？他们对自由主义价值和准则有什么反对意见？为什么反自由主义者将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由主义(理论与社会杂乱地混在一起)描述为一个巨大的错误？

这些问题不能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加以回答，因为反自由主义同自由主义本身一样不统一。非马克思主义的反自由主义来自许多阵营，而不同的形式需要仔细区分开来。但是，甚至分属不同的敌对阵营的反自由主义者们 [如卡尔·施密特 (Carl Schmitt)、列奥·施特劳斯 (Leo Strauss)、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 (Alasdair MacIntyre)、罗伯托·昂格尔 (Roberto Unger)]，也有一些共同的主题。例如，他们都涉及文化批评 (Kulturkritik)。并且，他们对现代文化的批评遵循一种相当标准化的格式，由此，“对自由主义的诋毁形成了对现代社会道德和精神堕落的一种总体悲切的一部分”。^⑥他们都解释道，更高的精神真理在当代社会中面临着危险，而自由主义在根本上是不可靠的。

诚然，甚至在最哲学的层面上，反自由主义也具有理论气质。它一直以来就既是一种感受，又是一种论点。同自由主义者相反，反自由主义的阐释者们消极地界定自己。因此，为了理解那些属于反自由主义传统的人，我们首先必须评估他们庄重地警告我们将会去面对的危险、威胁或可怕的力量。他们的敌意非常典型地滥施于个人主义、理性主义、人文主义、流离失所、放纵、普遍主义、物质至上主义、怀疑主义和世界主义之上。他们说，体现自由主义政治核心的是这些有腐蚀性的态度，而不是权力分立、竞选、出版自由、宗教宽容、公开预算或对警察的司法控制。这些态度也是现代世界文化衰败和道德瓦解的主要征兆。因而，要将一个既定的作家归为反自由主义者，必须看他反感的对象，还要注意其风格和立场，这样在碰到它们的时候，才能学会辨别反自由主义的理论著作。下面是反自由主义独特特征的一个初步对照表。

（四 基本态度和主张

反自由主义作家经常通过确认一个罪犯，并引导一场审判来唤醒读者。相应地，他们把自己视作进行诊断的病理学家：整饬无序状态的医生。他们经常就古书籍写很长的评论，但其主要目的是谴责和诊断当代社会的堕落。他们在警告人们一些即将来临的危险时，谴责了“20 世纪的道德匮乏”。例如，这些危险包括“当今世界的政治危机以及即将来临的精神危机”。

不同的批评者关注现代社会所潜藏的“危机”的不同方面。但是，大多数都对社会普遍分解为原子化的个人敲响了警钟：自私、算计、物质至上主义，每一个都与其他所有的相冲突。人类需要根基和归属感，但是自由主义社会将他们拆散并把他们置入剧烈的、无所寄托的流动之中。

反自由主义者们也痛惜“启蒙运动的偏差”，他们认为，启蒙运动“在我们看来，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在此，他们指的是“一场自主的、无信仰的人文主义意识的灾难”。他们称，世俗人文主义挺立于自由主义灾难的源头。现代早期“发生了一次彻底的解放，从基督教世纪的道德传统”，“从前 1000 年的传统中解脱出来”。自由主义是这次重大的解放运动的政治分支。

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在此所讨论的批评者们一直坚持认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能追溯到一个共同的根源，这一根源通常被描述为一些规范性承诺，包括：“无限的物质至上主义”、“人的个性的解放与发展”、“不信教的自由”、“认识社会的所谓科学的方法”以及对人类“世俗幸福”的排他性关注。

若非在现代文化中有着重重要的非自由主义流派，在现代政治中有着重非自由主义运动，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反自由

主义者，还会将自由主义等同于现代性。结果，他们一律低估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每个历史学家都能解释的事实：自由主义传统虚弱和被围攻的状况。

他们继续称，现代社会的疾患，源于对自由主义理论的病毒性感染。智识灾难发生于历史上一些戏剧性的转折点，通常在 17 世纪：“在欧洲数世纪之前这种哲学就诞生了。”现代“危机”有着智识上的渊源这一观点，对所有反自由主义者都至关重要。某个哲学错误或违抗行为，标志着现代堕落的开端：“错误一定存在于根上，存在于现代社会思想的发端处。”这一哲学上的失足通常被描述为一种遮掩或遗忘行为。在前自由主义社会中，众所周知的一些重要精神真理，现在被压制了或不为人所知。社会健忘症是由哲学导致的，有着灾难性的后果。

最后，非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们，有着强烈的使命感。接受了对于自由主义的“根一枝”批评模式的读者，被允诺可以参加一场空前的、重塑世界的斗争，以复兴被遗忘的智慧。他们能帮助将人性从悬崖边拉回来。如果被压制的真理可以重新恢复，现代社会不仅将被确诊，而且还能奇迹般地或英雄般地被治愈。

在我看来，前面章节中的引语是典型的反自由主义的。这些引语取自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所写的两篇文章^⑦，它们所表达的观点甚至所用的语汇都惊人地相似。实际上，索尔仁尼琴的词汇同施特劳斯或麦金太尔的如此相似，以致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一种单独的反自由主义精神（Geist），正通过他们所有人传达出来，这种精神连接了民族传统和宗教传统。当然，不同点和相同点并存着。例如，施特劳斯和麦金太尔都没有郑重地提议清除国家中的外来影响，或者领导其人民回归其根，从而拯救祖国，免于现代社会的堕落。但是，这

种关于“危机”和道德贫困的论述，对“现代性”的病理分析方法，将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回溯至同一源头，不守规则的哲学家是不可靠的这一假设，以及隐含的拯救许诺，对他们所有人都是共同的。

这些主张或态度，异常坚定地反复出现在无数著作，包括当代的著作中。它们集合在一起，构成了实际起作用的反自由主义思想的明白无误的标志。按我的理解，当一本书、一篇文章，或者一个公共演讲包含这一系列观点时，它就属于反自由主义传统。下面所研究的作家们的重要区别，尽管它们本身也很重要，但主要是为了使反自由主义隐含的共性显现出来。

（五 本书的源起和结构

这项工作始于对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美国写作的当代反自由主义者们的考察，特别是麦金太尔和昂格尔。在追溯其基本论点时，我发现自己被驱使向后，穿越时间，遇到一些更伟大的作家——首先是施特劳斯和施密特，最后是反自由主义运动真正才华横溢的原创者之一约瑟夫·德·梅斯特尔。由梅斯特尔和施密特所提出的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是大胆而不妥协的。（其中一些打动了我，有说服力，或者至少很难加以驳斥。）但不能说这些批评被战后的反自由主义者推进了。在这些新近的著作中，反自由主义的方式被缓和或减弱了，或者学术化了。无论如何，要理解反自由主义者现在为何采取了一种较为平和的形式，就必须回顾其早期更为严厉的表现。

当我开始对当代作家进行研究并向后追溯时，在构思本书的过程中，我采取了相反的方法。在第一部分中，我或多或少地按照时间顺序，考察了一系列与众不同的反自由主义理论家，

由梅斯特尔开始，向前一直到麦金太尔和昂格尔。（当然，仅仅因为他们相互之间有很重要的区别，所以关于每个人单独写一章是有益的。）我的批评（我的目的是批判）主要是内在的，也就是说，我关注于所讨论的每一部作品的智识上的不一致性和紊乱，以及它们所提供的实践方案的不足。我在一个更为普遍的层次上作结，描述并批评了美国当前最流行的反自由主义形式——“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的主要理论谬误。

在第二部分中，我转向一个更为专门的主题：对反自由主义著作中所阐明的反自由主义理论作出历史性描述。我重申了反自由主义关于自由主义思想的历史的最为普通的主张，并试图展示，为什么这些主张在很大程度上被误导了。在我纠正反自由主义的历史编纂之主要错误时，我组合出另一种自由主义面貌的诸多要素。这使我得以以某种更为肯定的结论结束本书。通过结束语，我简要回顾了所研究的反自由主义的种类，尝试更精确地指出它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并且，我还重新考虑了，通过研究自由主义最不留情的批评者，我们学到了关于自由主义的什么东西。

我按照时间顺序处理单个作家，主要是为了方便。我没有写关于反自由主义理论的叙述性历史。在第一部分里，我的目的是理解一些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写作的重要的反自由主义者。他们的共同点更为引人注目，因为他们是在对如此不同的环境做出反应。首先，我努力按照每个反自由主义者自己的术语去理解他们，其次，在他们之间建立一种对应。我对智识影响或世系的兴趣不大，尽管这些关系偶尔也被论述到了。结果，本研究作为一个整体，保持了更多的理论性而非历史性。它确实没有提供关于这个漫长的、明显不可遏止的传统的全面审查。本书还舍弃了许多重要的反自由主义作家，他们本来能够并且可以被包括进来。作为补偿，本书提供了一个相对简单的分析框架，以归类和评估

“无法断代的”（dateless）反自由主义者的论断。我深入到底层，以揭示我所认为的反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轮廓。

梅斯特尔、施密特、施特劳斯、麦金太尔和昂格尔展示了反自由主义理论相当广泛的一个范围。无论其中能发现什么统一性，都同丰富多彩的种类是相容的。事实上，之所以选择这些特定的作家，是因为他们是独特的，本质上很有趣，在美国的论战中非常著名，有着广泛的影响，并代表着更为宽广的趋向。[我有意排除了不彻底的社群主义者们，如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他非常认同个人自主、对多样性的宽容以及个人权利。]当然，甚至被选来详细考察的作家，都不是“纯粹的”反自由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一切都是折衷的，有时转向更为温和、更可辩解的境地，就像托利党（Tory）保守主义或奥古斯丁基督教（Augustinian Christianity）一样。

此外，同斯特恩赫尔（Sternhell）所研究的反自由主义宣传册作家不同，下面所讨论的当代作家（如麦金太尔和昂格尔），从未亲自同富有战斗精神的“骨干”或者强大的激进型社会运动发生过联系。活跃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们，同当今美国反自由主义者们一样，提出了许多同样的主张。但是，法西斯主义包含剧毒因素 [如种族歧视，关于“内部敌人”的执见、元首制（Fuhrerprinzip）、国家崇拜、暴力崇拜，等等]，远远超出了战后反自由主义者在主要面对美国听众时所提出的任何观点。因此，我将没有侵犯性的社群主义同法西斯主义并列，不是因为它们的政纲是可比的（正如所提到的，社群主义似乎没有政纲），而是因为，他们所提出的反对自由主义的控诉惊人地相似。

虽然新近的反自由主义者们对于法西斯主义年代几乎完全保持沉默，但法西斯主义经验还是重塑了他们所使用的辞令。首先，

1945 年以后，社群主义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攻击彻底非军事化了，对爱国牺牲的要求降低了。的确，战后反自由主义著作没有完全清除对男子气概、军事荣誉的偶然呼吁，以及战争培育“美德”^②的观点。但是，对这些著作中的军国主义残余不能看得太过认真。当麦金太尔或昂格尔暗示说在战场搏杀中杀死敌人或者冒生命危险可以为解决商业社会精神空虚提供一种方案时，读者会稍感厌烦，但随即正确地摒弃了他们所说的话的字面意义。战前的反自由主义者，例如施密特，则明显地更加认真、严肃。

因此，有形形色色的反自由主义者和反自由主义。尽管有着一个共同的敌人，非马克思主义的反自由主义者们却以不同的方式攻击自由主义，并且他们之间也激烈地争论着。但是，尽管有很多区别，下面所讨论的作家们却都有着一种共同的、根本的感受，从而导致一种共同的处理方法。例如，他们中间没有人以普遍主义或启蒙运动的理想来批评自由主义。汇集为一组群像，他们揭示了任何大家庭中都可观察到的迷人的多样性。然而，他们当然属于同一类人，并且，他们一起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单独传统的多种面貌。对关于这一强大的智识运动进行案例研究，最有可能成功的地方就是天主教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

注释：

这一态度的一个极佳范例是卡尔·施密特的主张：“美国金融家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在争取经济主义思想胜利的过程中联合起来” [施密特，*Römischer Katholizismus und politische Form* (Stuttgart: Klett-Cotta, 1984). p. 22]。

② Zeev Sternhell, *Neither Right nor Left: Fascist Ideology in France*, trans. by David Maise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另参见 Zeev Sternhell, *Maurice Barrès et le nationalisme français* (Paris: Seuil, 1972); *La droite*

révolutionnaire: Les origines françaises du fascisme 1885—1914 (Paris: Seuil, 1978); 以及 Zeev Sternhell, Mario Sznajder and Maia Asheri, *Naissance de l'ideologie fasciste* (Paris: Fayard, 1989); Andrzej Walicki, *The Slavophile Controversy: History of a Conservative Utopia in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n Though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以及他的 *A History of Russian Thought: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Marxi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专制社会主义 (Authoritarian Socialism) 在不发达国家中的胜利, 可能部分源自马克思主义对传统主义和现代性的混合。其“新传统主义”的现代程度足以拒绝先天性垄断, 但其古旧的程度足以保持传统上对新的经济不平等的禁止。

亚当·斯密 (Adam Smith): 《国富论》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37), p. 11; 此论点为约翰·罗尔斯 (John Rawls) 所称“差别原则” (the difference principle) 的古典范例。“差别原则”作为自由主义的规范意指, 不平等的正当性不能通过类比价值或存在物在宇宙中的等级秩序得以证明, 而只能通过它带给社会中境遇最差的成员的明显益处得以证明。(很明显, 关于社会免于贫穷和依赖的自由主义理想, 时至今日依然没有完全实现。)

关于自由主义传统更详尽的论述, 参见 Stephen Holmes, *Benjamin Constant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Liberal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以及拙著 *Rediscovering Liberal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⑥ Francis Coker, “Some Present-Day Critics of Liberalis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7 (March 1953), p. 12.

⑦ Alexander Solzhenitsyn, *Warning to the Wes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76), pp. 79, 127, 146; 以及他的 *A World Split Apart*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8), pp. 47, 51, 53, 57.

⑧ 例如, 见 Alasdair MacIntyre (麦金太尔), *After Virtue*, 2nd ed. (Notre 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4), p. 200; Roberto Unger, *False Necess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581.

第一部分

反自由主义者

第一章

梅斯特尔与反自由主义传统

以下章节所分析及重新评价的反自由主义者们许多重要方面都彼此不同。可是，他们却一致将启蒙运动的世俗人文主义（humanism）当做他们共同的敌人。而且他们对自由主义的制度及观念表示出一致的鄙夷。可能是由于天真，也许是出于心计，他们将自己表现为批判传统的革新者和不随波逐流的思想家。但实际上，他们却坚定地固守着一个更大的传统。对这一传统他们很少公开讨论。本书的宗旨之一就是这一传统从地下置于光天化日之下。

什么是反自由主义的谱系？这一传统什么时候开始形成？首先，在自由主义自身形成之前，反自由主义不可能存在。虽然反自由主义者可能会求助于柏拉图或奥古斯丁的权威，但作为一种思想潮流的反自由主义，其起源大概应该确定在 18 世纪。在其发轫之初，是卢梭帮助推广了一种反资产阶级的意识，这种意识深刻地影响了后来那些自由主义理论及自由主义社会的批判者。一个世纪之后，尼采将他自己对康德及穆勒的轻蔑与他对现代欧洲社会病态的刻薄诊断结合起来。然而，为了有助于把握反自由主义的历史深度，我既不直接考察卢梭，也不考察尼采，而选择约瑟夫·德·梅斯特尔（Joseph de Maistre）。梅斯特尔一生都致力